

改革开放与中国话语的创新

张 明

摘 要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建设话语的相对供给不足,推动了改革开放的突破性探索,内在预设了中国话语创新的理论空间。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实现了从世界舞台的边缘走向中心的巨大转换,这种发展方位的巨大历史性变迁对中国话语的创新提出了全新要求。改革开放的显著成就不仅从根本上保障了中国话语的生命力,而且也建构了话语自信的内在根基。改革开放推动中国话语历史性建构的核心在于,科学回答了在经济文化水平相对落后条件下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时代之问与人民之问。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步入新时代的背景下,中国话语的创新与发展具备了前所未有的新特点,其中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新时代中国话语的建构愈发具有从特殊性上升到普遍性的趋向,中国话语在全面深化改革的伟大历史征程中具备了广阔的理论空间。其中,如何“讲好中国故事”,构筑好中国话语的对外传播方式,构成了推动新时代中国话语创新性发展的重要路向。

关键词 改革开放;中国话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国道路;理论创新

中图分类号 D610;D61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7320(2019)02-0012-10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18JJD710002)

所谓中国话语,并非是宽泛地指向中国存在的各种话语形式,而是特指改革开放以来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关于“中国道路”的理论表达,即阐释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这一话语体系的核心内容在于,结合时代条件和具体现实,科学回答如何在中国通过改革开放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问题。改革开放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概念谱系与理论资源库中是一个全新的理论和实践形式。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推进,并不是单纯依靠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设想,而是在面对中国传统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巨大困境下所进行的重大突破性发展。正如邓小平后来所言,“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1](P382)。这一点符合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在发展逻辑和理论基因。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逻辑出发点,并不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某个概念或论断,而是中国革命实践不断变化发展的生动现实。毛泽东早在《反对本本主义》中就明确批评了本本主义的理论态度,坚持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出发发展开现实的实践斗争^[2](P111-112)。可以说,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呈现出深刻的“实践先行”而非“理论优先”的重要特质,即不是首先“拿来”或“发明”若干抽象理论概念指导中国革命实践,而是以现实实际情况为基点,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通过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进而指导革命实践活动的开展,并逐步总结经验、建构新的理论话语。改革开放内在地坚守了上述理论路径,它并不是在固有抽象理论概念的指导下加以推进,也不是预先创造出一整套相关的概念、话语或理论体系来指导实践,而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下,以“摸着石头过河”的精神推动实践与理论的突破性发展。“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得以深化”^[3](P497)。改革开

放是在传统社会主义实践困境中逆势生长起来的,它不仅改造了中国现实,而且也改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催生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话语的突破性发展。

一、改革开放的实践突破与理论创新

纵观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与教条主义、原教旨主义的斗争构成了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所面临的一个核心问题。在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发展史上,教条主义在一段时间内对中国革命产生了极为消极的影响,其照搬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本,用固化的本本裁剪现实生动的实践,自以为严格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律令”,实际上却是对马克思主义精神实质的严重歪曲与误读。对此,毛泽东曾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实际情况相结合”^[2](P111-112)。然而,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过去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实践往往存在一种固定化思路,即坚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未来社会的若干设想不动摇,坚持社会主义现实实践过程中的样板经验——“苏联模式”为参照,不敢越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教义和苏联经验的雷池一步。这是由理论与实践层面的双重困境所导致的。

一方面,就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本身而言,较之经典作家关于资本主义批判的丰富性内容,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显得较为薄弱。这主要是因为经典作家基于批判推翻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其统治秩序的主要任务所限,因而使得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导致相关理论供给不足。无论是《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关于未来社会分工问题上带有浪漫主义气息的“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的设想^[4](P537),还是后来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和“高级阶段”的区分以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想象^[5](P435-436),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并未给未来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提供一整套完整的理论结构。

另一方面,现实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验的相对有限性,又增加了中国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复杂性与艰巨性。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学习当时唯一可供参考的苏联经验成为一定意义上的历史必然。然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学习苏联经验时“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6](P117),因此,从当时中国丰富的革命理论资源库中寻求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与经验,成为中国社会主义探索时期的路径依赖。在这一过程中,“群众运动”“大决战”等革命斗争的理论话语,被直接引用到指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这是在现成经验相对不足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的路径依赖。但因为革命与建设实践的内在差异性,这种依靠革命理论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发生了系列曲折。

面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建设话语相对不足的实际情况,中国共产党人在当代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不可能寄希望从经典理论话语那里获得现成可供直接使用的答案,而只能按照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从当代中国实际出发,不断推动实践创新与理论创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经典理论话语的相对不足,恰恰规避了以往在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对经典理论过分依赖与盲从的危险。社会主义建设经典话语供给的相对不足以及现实实践的挑战性与开拓性,倒逼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实际出发,不断推进中国实践的创新步伐,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形成中国经验,最终总结提升为中国话语。在当代中国推动社会主义建设,不能寄希望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为我们提供现成的答案,因为当代中国最广泛、最深刻的实践活动,其深度与广度已经远远超出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当年的想象^[7](P346)。

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中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推动中国实践与中国话语的双重创新,明确摒弃了两种错误思维的限制。一是教条主义态度。这种态度固守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本本,脱离具体历史实际与时代特征,照搬照抄经典本本,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语录来裁剪现实实践,拒绝在理论话语上做出符合实践特色与时代特征的新突破。殊不知,开放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8](P9)。只有以发展的眼光对待马克思主义,才能使理论不断跟上实践与时代的步伐,才能不断以新的理论话语指导新的实践。二是经验主义态度。这种态度固守现实的感性经验,拒斥理论层面的总结与指导,认为只

需按照现有经验就可以推动实践的发展。殊不知,脱离科学理论指导的实践,在本质上是盲目的。固有经验的有效性存在时空范围的局限,必须在科学理论指导下不断进行革新与提升。以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为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开辟,关键在于确立了科学对待苏联经验的理性态度。一方面承认苏联经验的相对合理性,承认它是经过苏联实践证明了的、符合当时苏联社会主义建设需求的理论总结;另一方面又深刻认识到苏联经验的合理性有其特定时空范围的界限,即其仅仅是针对当时的(时间上)苏联的(空间上)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具有指导意义,不能直接挪用到无论是现实境况抑或是历史传统都具有重大差异的社会主义中国加以使用。

改革开放的突破与发展,正是以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话语的重大创新为先声,即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以往在评价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意义时,往往将其针对域仅仅界定为“两个凡是”,认为通过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解放了思想、肃清了“两个凡是”禁锢在人们头脑上的思想障碍。诚然,从表面上来看,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确实是直指“两个凡是”,但从更本质性意义上来说,通过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根本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推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因此,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针对域,其实是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设想,通过讨论破除的其实是对经典理论设想的教条主义崇拜,树立了基于中国具体实际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实事求是之路。正如邓小平当时明确指出的那样,“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这一问题从根本上“涉及到怎么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9](P114)。这里所言的“怎么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主要是如何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关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因为当时面对中国传统社会主义实践步入困境,使得探索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成为摆在中国人面前最为紧迫的问题。“因为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这样的事,马克思的本本上找不出来,列宁的本本上也找不出来,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情况,各自的经历也不同,所以要独立思考。”^[1](P260)邓小平在支持与引导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过程中,始终着眼于中国社会发展的全局,使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过程成为引导人们思考国家发展命运走向的过程,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为这场讨论的立脚点^[10]。

从根本上来说,通过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促进了思想大解放,摒弃了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设想的教条主义态度,确立了从中国实际出发、科学对待苏联经验与中国传统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理论姿态,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并在此基础上不断推动中国话语的历史性建构。因此,由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所掀起的思想解放主要有两大针对域:一方面,从理论上来看,主要针对以教条主义的方式对待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的“理论设想”;另一方面,从实践上看,主要针对传统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存在的对苏联模式照搬照抄的经验主义态度。当然,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解放思想并非意味着比谁的胆子大,比谁敢反叛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而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基础上的思想解放,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本质上是辩证统一的。这是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能够不断形成关于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建设的诸多具有中国特色与时代特征的理论话语的根本原因所在。

二、改革开放的发展与话语建构的内在诉求

纵观人类社会发展的整体历史进程,尤其是近代以来大国崛起与复兴的历史,我们看到,大国的崛起并非是一个由单纯客观物质力量所推动的经济发展过程,它更是内在蕴含着话语崛起与理论逻辑建构的张力。也就是说,表层维度的经济合理性过程与物质生产力的崛起,是以更深层次的理论话语层面的自我建构作为先导的。这一点在近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崛起与发展过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从表面上看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胜利,但与客观生产方式并行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先行的是对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理论表达的逻辑建构。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对封建主义的胜利,不仅仅体现在生产方式等客观维度的革新上,更首先体现在资本主义理论话语逻辑的革命性维度上。资产阶级革命

的重要表征就是从观念、意识层面展开对传统形式的革命性颠覆以及全新理论逻辑的建构,“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11](P403)。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重要表征的现代理论话语,诸如工业、资本主义、无产阶级等,都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不断被发明与建构出来的,这些具有现代意义的词汇与理论话语不外是资本主义社会崛起的重要形式。正如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所言,倘若没有这些现代词汇与话语,则无法从根本上去估量资本主义革命的深远意义,也无从去构想人类历史自从发明农业、冶金术和文字、城邦以来这场最伟大变革的思想史意义^[12](P2)。

可见,资产阶级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的巨大历史性意义,不仅仅局限在对社会物质生产力的巨大解放与提升上——“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11](P405),而且更为重要地表现为资产阶级理论话语抑或意识形态在世界范围内所取得的排他性统治地位。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曾这样描述:“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11](P404)资产阶级推动生产力层面的高歌猛进,其实与资产阶级的理论建构、输出之间保持着同频振动的关系。生产力的发展需要理论话语的革新,而资产阶级理论话语革新及其强势输出,又进一步推动了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

以资产阶级的现代化为例,这一概念其实蕴含着资本逻辑的强烈话语操控倾向。诚然,作为一种客观的历史事实,现代化(资产阶级的工业革命与理性启蒙运动)确实首先发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因而西方社会在时间上确实取得了现代化的优先地位。但这种时间上的优先,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学家那里,通过话语逻辑的操控则被转化为逻辑上的唯一性和排他性,即资本主义代表了人类走向现代化的唯一可能性,一切民族国家必须依循资本主义的话语逻辑,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即可完成所谓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升级。很明显,这里资产阶级理论家通过意识形态的操控,其实已经完成了双重维度的理论建构,一是人为建构了所谓落后与先进、传统与现代的对立;二是将西方模式装扮为走向现代化的唯一路径,即关于资本主义“终结历史”的理论建构。可以说,伴随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建立及其效应的不断扩大,其实也是资本主义理论话语不断建构、输出并取得统治性地位的历史。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理论神话批判性解构的关键在于,重新将历史性内涵赋予资本主义及其统治秩序之上,“虽然许多社会制度都喜欢用‘不朽’的神话掩盖自己终将灭亡的本质,但世界上的任何事物有始就必然有终。……马克思第一个提出了‘资本主义’这种历史现象,他向我们展示了资本主义如何兴起,如何运行,以及它可能的结局”^[13](P3)。

近代中国正是在殖民主义现代性的冲击下被卷入现代性的浪潮中,并在这一过程中不断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与压迫。“落后就要挨打”不仅反映了近代中国的现实生存窘境,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折射出近代中国在面对西式现代性时的理论贫困,即无法解释近代中国在世界历史版图中的位置,无法回答近代中国将走向何处的时代之问。正如有学者明确指出的那样,“话语的崛起,前提是物质崛起;话语的贫困,首先源于物质贫困;话语的背后,是硬实力的较量”^[14]。面对话语贫瘠的理论困境,中国先进仁人志士率先展开了学习西方的探索性实践,其间经历了从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的曲折转变,学习、模拟西式理论构成了贯穿上述历史进程始终不变的一根红线。然而,实践证明,单纯模拟西式理论并不能阐释近代中国社会走向的核心问题,“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15](P1470)成为不断拷问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时代问题。面对中国近代社会历史发展的困境与理论贫困,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先进分子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将其作为观察宇宙、改造社会的工具。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展现出强大生命力,并非是因为它内部逻辑的自洽性,而是因为它能够承担解释近代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所面临重大问题的理论重任,理论符合实际并能够解释指导实践,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被不断接受并呈现

出强大生命力的根本原因。“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主义,关键要看这个主义能否解决这个国家面临的历史性课题。”^[3](P109)正如毛泽东所言,“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2](P111)。

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结合中国革命斗争的实际经验,创造出诸多契合中国实际、能够指导中国实践的中国话语,其中最显著的例子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化、中国化。从来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16](P534)。立足于中国革命实践与经验基础之上,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中国经验进行系统化总结与提升,中国共产党人极大丰富发展了指导中国实践的理论话语,例如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社会主义革命理论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形态,推动中国革命实践不断走向成功。

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立足中国经验,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建构中国话语的基本原则。中国话语理论内涵的不断丰富、生命力的不断增强以及影响力的不断提升,关键原因在于中国实践的不断成功推进。长期以来,中国因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的限制,处于世界历史舞台的边缘,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格局中处于弱势地位,国际话语权与国际影响力相对比较弱小。一方面,目前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主要是由少数西方发达国家建构的,主要反映西方发达国家的意志与意愿,广大后发民族国家则被人为地排除在国际话语之外,只能被动接受西式话语逻辑的操控;另一方面,西方社会关于中国问题的解释,往往在“西方中心论”思想的指导下,依据西方固有的模式或理论来简单地套用中国实践,因而诸多关于中国问题的解释都是一种源于异域的想象性或漫画式勾画。可以说,就现阶段而言,国际话语格局中“西强我弱”的局面仍未得到根本性改变,建构具有中国特色、反映中国风格的话语仍然面临着诸多挑战与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综合实力与国际影响力逐步提升,逐渐从世界舞台的边缘接近中心,中国的大国地位需要有与之相适应的理论,需要能够阐释中国发展原因、指明中国发展前景的理论。这一由现实实践所提出的理论层面的需求与现阶段中国话语供给相对不足之间的矛盾,构成了考验中国话语建构的重大问题与主要矛盾。

三、改革开放实践的显著成就与建构中国话语的内在根基

理论话语始终与特定政治经济社会关系相关联,是特定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状况的文化表达与理论提升。因此,作为逻辑概念表达形式的理论话语,其背后折射的是特定现实社会关系总和的理论张力,尤其是物质生产性活动的现实张力。马克思曾对观念、理论的物质基础问题作出过明确阐释,唯物史观“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11](P172)。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所谓理论话语的建构,从来不是一种闭门造车式从概念到概念的抽象逻辑演绎过程,而是基于特定物质生产及其所规定的现实境遇下进行的一种理论生产性活动——理论生产是物质生产状况的抽象反映。有什么样的社会物质生产方式,就有什么样的理论生产方式与之相适应;社会物质生产发展到什么水平,理论的生产与供给就会发展到与之相适应的水平。在手推磨时代只可能产生封建主的社会,在这一社会形式下也就只可能形成前现代的封建主义理论话语;而在蒸汽磨时代所造就的工业资本家的社会形式下,一系列代表大工业生产方向与前景的启蒙主义现代性理论被不断建构。

所谓理论自信,不是对抽象概念、理论话语的自信,脱离实践的抽象概念形式难以生成现实的生命力,对抽象理论话语的自信从根基上看不过是一种理论上的幻象。其实,对于话语的自信,主要不是对话语本身的概念形式表达自信,而是对话语背后的现实力量表达自信,恰恰是话语背后现实力量的强大生机与活力,才能从根本上催生主体对作为现实力量之概念表达形式的抽象话语产生自信。改革开放以

来,之所以能够不断建构出中国话语,并且持续保持对中国话语的巨大自信,主要不是因为这些理论所具有的华丽辞藻或精美概括,而是因为作为中国话语背后现实支撑的中国实践所彰显的显著成绩,话语背后的现实物质力量从根本上保障了中国话语的生命力,进而催生了对中国话语的强大自信姿态。

中国通过改革开放极大解放了社会生产力,提升了人民生活水平,增强了国际影响力,“中国震撼”与“中国奇迹”在很大程度上成为西方社会观察当代中国进步与发展的重要代名词。改革开放的显著实践成就表明,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艰辛走出来的道路,符合中国的实际与人民的需要,坚持走中国道路是历史逻辑、理论逻辑与现实逻辑相互统一的必然结果。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所取得的显著成就,从根基上夯实了中国话语建构的可能性空间,也从现实层面证明了中国话语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因为衡量一种理论话语的科学性与真理性,绝非是一个单纯抽象逻辑思辨的过程,而是一种必须接受现实实践检验的主观见之于客观的能动过程。“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 [gegenständliche] 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11] (P134) 立足于中国实践所积累的中国经验基础之上,中国话语被不断建构与生成。只有中国实践不断取得胜利,才能从根本上完成对中国话语科学性的论证问题。

实际上,改革开放之初,主要是通过“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探索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这使得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都主动回避讨论中国经验与中国话语的普遍性意义问题。之所以如此,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在当时是前无古人的探索性实践,可供直接使用的现成理论和经验都十分少,中国话语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滞后于中国实践的步伐,因而在改革开放之初探讨中国话语普遍性意义的可能性空间并不大。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总结传统社会主义实践困境基础上的产物,其中最重要的经验之一就是规避抽象的理论争论,着力于求解现实层面的实践问题。“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1] (P374) 因此,在全国皆致力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背景下,自然很少有精力去探讨所谓中国话语的普遍性意义问题。三是改革开放初期实践成就相对不足,难以构筑探讨中国话语普遍性意义的物质基础。这里所言的相对不足,不是说改革开放初期没有取得成绩,而是较之当前经过 40 年实践积累的成就相比,改革初期的成就是在相对有限意义上展开的,主要表现在对社会主义生产力水平的提升上。而当前的实践成就是全方位的,并且在许多方面通过求解世界性问题而取得的成绩,是具有世界普遍性价值与意义的。40 年的实践证明,在改革开放中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符合历史发展的必然性逻辑,其中诸多经验对于求解世界历史性难题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这种实践层面的显著成就与理论自信,是当前超越特殊性、上升到普遍性维度探讨中国话语的根本保障。例如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样的全新理论,之所以能够在当前实践中被不断建构出来,关键在于以改革开放为代表的中国实践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显著成绩,从根基上夯实了中国话语建构的物质基础与理论自信。

四、改革开放与中国话语的历史性建构

理论话语从来都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体系,因为任何理论话语的生成与发展都无法从根本上脱离一个时代社会历史条件的决定作用。就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而言,理论话语的产生从根本上与人的物质生产、交往活动密切关联,是人类物质活动的直接产物。而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从根本上受制于一定时代条件,即“受自己的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的一定发展——直到交往的最遥远的形态——所制约。意识 [das Bewußtsein] 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 [das bewußte Sein], 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4] (P524-525)。由此可见,理论话语形成的本身就是社会实践活动的内在需求,理论的建构也是基于社会实践基础上的抽象表达,理论生成的内在逻辑结构也符合人类认识论的一般规律。换言之,在人类社会实践活动展开之初,并不存在一整套理论话语结构,理论话语的生产从根本上与社会实践活动的发展之间保持着双频共振关系。对此,马克思曾明确指出了理论话语

生成的社会历史性特征,“‘精神’从一开始就很倒霉,受到物质的‘纠缠’,……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4](P533)。

理论是实践经验的逻辑总结,话语是时代声音的抽象表达。从理论话语的产生机制而言,任何一种理论话语从根本上不外乎是现实实践经验的系统化、抽象化总结。理论的革新离不开实践的创新,现实实践为理论的建构提供了最基础的素材与养料,脱离实践无从谈及理论的创新问题。

就马克思主义而言,这一理论的原初形式是建立在对19世纪欧洲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实践经验总结之上的理论产物。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史上,原初经典理论在向其他国家、民族的传播过程中,不断接受来自他国实践经验的冲击并在此基础上做出理论上的回应,其结果便是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具体化、民族化与时代化,不断建构出作为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的新型理论形态。这一点从根本上是由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开放性特征所决定的。中国共产党在面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时,正是严格秉持了其开放性理论特征,并不断结合中国实践经验,对此作出了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风格的突破性发展。毛泽东曾多次指出,需要结合时代特征与实践特征,创造出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6](P109)“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如果单有《实践论》、《矛盾论》,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6](P109)改革开放以来,面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全新局面,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动摇,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建构中国话语过程中的指导性地位;另一方面又结合改革开放的全新实践,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做出了具有时代特征与中国特色的创造性发展。这就是邓小平所说的“老祖宗不能丢啊!问题是要把什么叫社会主义搞清楚,把怎么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搞清楚”^[1](P369)。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也曾明确指出,改革开放成功的基本经验之一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不断推进在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5000多年文明史、13亿多人口的大国推进改革发展,没有可以奉为金科玉律的教科书,也没有可以对中国人民颐指气使的教师爷。”^[17]

改革开放就是以开放性姿态面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产物,它在坚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下,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出发,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话语做出了符合时代需要、具有中国特色的创新与发展。改革开放推动中国话语历史性建构的核心在于,科学回答了在中国经济文化水平相对落后条件下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时代之问。中国道路在本质上其实是对“中国未来向何处去”这一重大问题的哲学表达^[18]。具体而言,面对传统社会主义实践因为过分依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未来社会的“理论设想”而导致的现实困境,中国共产党树立了解放思想的科学原则,不过分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具体结论,更多地从将思想从条条框框中解放出发,以契合现实不断变动的实践运动,始终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出发思考问题、解决问题;在解放思想精神的指导下,科学分析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情况,即中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全新理论话语;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指导下,明确了中国必须解放发展生产力——因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因而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提出经济建设中心论;为解放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必须通过改革的方式消除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机制与体制,通过对外开放的方式学习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生产水平与管理经验,从根本上推动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自我调整;通过改革开放的全新话语与实践,改变了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解,即原先过分从静态生产关系层面强调社会主义的纯粹性,转变为更多地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结合的视角出发,以一种动态功能性的范式理解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即“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

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P373)。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标志着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步入一个新的历史方位。这一新的历史方位可以从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实现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历史线索,即从中华民族主体性身份重构的角度加以把握;也可以从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谱系出发把握,即意味着社会主义在21世纪中国焕发出巨大生机与活力;还可以从人类走向现代化的途径角度出发把握,意味着中国道路为丰富人类现代化图景提供了“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19](P10)。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步入新时代的背景下,中国话语的生产与发展具备了前所未有的新特点,其中最显著的一条特征就是新时代中国话语的建构愈发具有从特殊性上升到普遍性的趋向。换言之,一方面中国话语是在基于中国实践基础上被不断建构与创造的中国式产物,另一方面它又呈现出诸多具有世界普遍性内涵与价值维度的新特征。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19](P11)。在这一新的时代语境中,当代中国的进步与发展以更加紧密的方式与世界历史发展的步伐挂钩,中国贡献也将在更加宽广的范围内和更加普遍的意义上被不断书写。在此过程中,一方面,如前所言,中国需要不断建构与其大国地位相适应的理论话语,例如,关于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新格局的探索性建构、全球治理体系建设、国际新安全观等全新理论正在基于中国实践的基础上,被不断地建构与创造出来;另一方面,也需要建构出易于为西方社会所理解与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和新表达^[20](P24)。可以说,当前中国话语的建构,一方面牢固坚守了基于“中国实践”的本土特色,另一方面也深刻凸显了立足世界历史发展潮流的普遍维度。中国话语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之所以能够不断突破特殊性而逐步上升到普遍性维度,关键在于它赖以支撑的中国实践的成就不断凸显,这种现实层面的理论自信是催生中国话语价值维度不断拓展的根本原因所在。

当然,还必须要看到的是,尽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话语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但当前仍然面临着深入推动话语建构的诸多困境与难题。诸如,理论创新落后于实践发展的步伐,在现实操作层面仍存在着在一定程度上面临难以找到合适、准确的概念与理论话语形式来概括表达生动变化实践的困难;理论话语形式的相对固化造成难以契合人民群众不断发展的现实诉求,从而造成理论话语传播的相对困难;理论话语内容的空心化与泛化,使得现有理论话语难以精确有效地反映与之相适应的实践活动,等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但实际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20](P24)中国话语目前所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在另一个维度其实也为话语的创新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契机,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现实实践层面面临着诸多新情况与新问题。一方面既需要建构大量与之相适应的全新理论形式与内容,以满足现实实践在理论层面的全新诉求;另一方面在反映新情况、求解新问题的过程中,也为全新理论的建构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20](P8)

推动新时代中国话语的创新与发展,必须要着力解决好中国话语的国际传播问题。因为新时代运用中国话语“讲好中国故事”,听众不仅是中国人,还包括西方社会的听众,中国话语不仅是具有民族风格的“中国方言”,而且还应当是能够被世界听懂的“国际话语”。尤其是随着中国国际地位与国际社会影响力的与日俱增,中国需要建构与自身“大国身份”相适应的国际话语,西方社会对“理解中国”的诉求也不断与日俱增。不仅如此,随着世界历史步入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四化”趋势不断增强(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各国之间的联系与依存不断增强,许多问题已经超越了单一国家能够解决的能力之外,成为具有普遍性意义的世界性问题。“世界怎么了?应该怎么办?过去主要是发展中国家感到迷茫,现在一些发达国家也感到迷茫。”^[21](P4)在此背景下,中国不仅需要为西方社会

理解中国发展提供合适话语——讲清楚“中国故事”，而且需要结合自身实际经验为求解世界性问题提供“中国方案”——讲明白世界道理，这无疑对新时代中国话语的国际传播提出了新要求。

一方面，需要寻找到西方社会易于接受和引起讨论的新概念、新话语。不可否认，中西方社会在社会制度、价值观念与思维方式等方面都存在不容忽视的差异性，中国经验在本质上是基于中国历史传统与现实境遇基础上做出的特殊实践，直接将其纳入西方社会语境之中，可能难以引起西方社会的关切与兴趣，也容易陷入自言自语、难以形成有效沟通与讨论的理论尴尬。倘若中国话语在内容体系、表达形式上与西方话语之间格格不入，就很难形成关于中国问题的世界范围内的相互讨论、相互交流^[22]。因此，在建构中国话语的国际传播形式时，一是需要找到使西方社会易于理解中国经验的概念表达方式，二是更需要注重将中国经验与人类社会，尤其是西方社会发展中所遇到的问题相关联，进而提升西方社会关于中国经验与中国理论的兴趣点与关注度，并激发西方社会从自身发展的实际出发探讨中国经验与中国话语的理论价值。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将中国的发展与世界发展挂钩，将中国的命运与人类命运相关联，“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理念决定了对这一问题的关注是中西方社会的共同主题，标志着新时代中国话语国际传播形式的重大创新。因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社会主义在话语表达方式上存在着系列区别——如主体、制度和意识形态、形成条件等方面的区别^[23]，这样的话语表述更加便于被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接受。但人类命运共同体与社会主义在根基上又是同向相行的，这又契合了当代中国发展的社会主义价值导向。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寻找西方社会感兴趣、易于接受的话语形式，并非意味着完全导向西方社会、迎合西方兴趣，如一些人为了寻找易于让西方理解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的方式，错误地将改革开放曲解为新自由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变体。在建构中国话语的国际传播形式中，仍然需要牢固树立中国话语的主体意识。

另一方面，在建构中国话语国际传播新形式中，要明确反对“一元中心论”的叙事模式。目前的国际关系格局与国际话语主要是由少数发达国家操控的，国际物质生产分工中的差序等级直接决定了国际话语生产分工的等级化，因而现有国际话语强烈地呈现出西方中心论的色彩。我们在建构中国话语的国际传播形式中，明确反对西方中心论的话语霸权，坚决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当然，必须要注意的是，反对西方一元中心论的话语叙事，并非意味着要向其他国家输出我们的理论话语与发展模式。当代中国的实践与中国话语仅仅是为广大后发国家求索符合自身实际的发展道路，提供一种不同于西方模式的另类可能性参考。因为中国话语首先是基于中国本土经验之上进行的理论总结，是围绕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重大现实问题展开的理论思索，深厚的民族性是其最为根本性的内容与特征。只有首先立足于本民族实践之上，解决好本民族的现实问题，才有更强的能力去解决世界性问题；也只有将中国的实践总结好，才有更强的能力为解决世界性问题提供思路与办法^[20]（P8）。

概言之，随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深入推进，中国话语的建构必然会迎来一个“理论上的春天”，即从过去在一定程度上依附西方话语体系中解放出来，批判地审视既往关于中国历史与现实的理论资源，立足于现实的实践经验，以自主性姿态展开关于中国道路的理论阐释。

参考文献

- [1] 邓小平文选：第3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2] 毛泽东选集：第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 [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6] 毛泽东文集：第8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
- [8] 习近平. 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 [9] 邓小平文选:第2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 [10] 陶文昭. 在改革开放伟大实践中检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红旗文稿,2018,(12).
- [1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12]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革命的年代(1789-1848). 王章辉等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 [13] 特里·伊格尔顿. 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 李杨等译. 北京:新星出版社,2011.
- [14] 陈曙光. 中国时代与中国话语. 马克思主义研究,2017,(10).
- [15] 毛泽东选集:第4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16] 毛泽东选集:第2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17] 习近平. 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人民日报,2018-12-19.
- [18] 汪信砚.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中国道路的哲学表达. 哲学研究,2018,(1).
- [19]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20] 习近平. 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 [2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 北京:学习出版社,2018.
- [22] 郭湛,桑明旭. 话语体系的本质属性、发展趋势与内在张力——兼论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的立场和原则. 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6,(3).
- [23] 梁树发. 认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三个维度.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8,(3).

Reform and Opening Up and the Innovation of Chinese Discourse

Zhang Ming (Nanjing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undersupply of the discourse in Socialist construction of classic Marxism promotes the groundbreaking explorations in the proces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and sets the theoretical space for Chinese Discourse in advance. China has turned from the edge to the centre of world arena, which puts forward a new requirement to the innovation of Chinese Discourse. The notable achievement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has not only constructed the vitality of Chinese Discourse but also the inner foundation of discourse-confidence. The core of promoting Chinese Discourse is to answer the question about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Socialism under the condition of backward economy and culture.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Discourse has unprecedented features whe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as reached to New Era, and the most important feature is the transformation in constructing Chinese Discourse from particularity to universality. How to tell a good story about China and spread Chinese Discourse well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path of developing Chinese Discourse in New Era.

Key words Reform and Opening Up; Chinese discours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the thought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 for New Era; China's road; theoretical innovations

■ 收稿日期 2018-09-05

■ 作者简介 张 明, 哲学博士, 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副教授、副主任; 江苏 南京 210046。

■ 责任编辑 涂文迁